

# 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文艺

曹晋杰

(盐城市政协, 江苏 盐城 224000)

[关键词] 新四军; 华中地区; 抗日文艺

[摘要] 华中抗日文艺事业是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坚持抗日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经过了四个阶段: 一、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4 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 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 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目的, 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开展。二、从 1938 年 5 月新四军东进江南, 至 1941 年初皖南事变, 主要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形式开展。三、从 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重建到 1943 年冬, 围绕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伪化和反磨擦, 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展开。四、从 1943 年 11 月华中局在淮南津浦路东搞文化实验区, 到 1946 年秋解放战争开始, 主要是深入贯彻《讲话》精神, 从发展民间戏曲入手, 使文艺更大众化、更普及。华中抗日文艺的主要特点是: 1. 贴近抗日的时代脉搏; 2 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实践; 3 在继承优秀传统文艺基础上发展创新; 4 尊重、关怀文艺人才, 引导支持文艺创作。产生的影响是: 1 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方面, 发挥了号角、战鼓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方面, 发挥了投枪、匕首的战斗作用; 2 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 发挥了与各界人士沟通、团结的作用; 3 在推动根据地建设方面, 发挥了很大的促进、激励的作用。因此, 华中抗日文艺不仅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在宣传和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揭露和打击敌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425(2007)05-0047-06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华中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 她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文艺活动, 谱写了中国抗战文艺的新篇章。

## 一、华中抗日文艺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事业, 是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坚持抗日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变, 到 1938 年 4 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这一阶段的抗日文艺活动, 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 以唤起民众抗日救亡为目的, 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进行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及江浙地区, 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和支持, 田汉等 29 人首先在南京创建了“首都文化界抗敌后援会”<sup>[1]P3</sup>, 开展演剧、教唱、散传单等抗日文

艺宣传活动。8 月, 在周恩来支持下, 郭沫若应张发奎将军所请, 组建了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团, 夏衍、石凌鹤等十多位知名文艺家加入。9 月, 郭沫若又应陈诚所请, 组建了以袁文彬(方强)为团长的第十集团军战地服务团。后来, 夏衍还帮助蔡廷锴部、罗卓英部组建政工队或服务团。应云卫在上海组建了“抗日救亡演剧队”, 瞿白音、魏鹤龄、赵慧琛等一批知名文艺家参加, 分赴无锡、江阴等地演出。在抗日前线河南, 中共河南省委指示河南大学组建农村服务团, 由范文澜任团长, 分赴许昌、阜阳等地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如此等等。这时, 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尚在筹备中, 华中抗日根据地尚未创建, 但华中各地的抗日文艺活动, 为后来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聚集了文艺人才, 打下了抗日文艺发展的基础。

第二阶段: 从 1938 年 5 月新四军东进江南, 至 1941 年初皖南事变。这一阶段的抗日文艺活动, 主要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组织形式展开。

[收稿日期] 2006-12-28

[作者简介] 曹晋杰(1935—), 男, 江苏盐城人, 盐城市政协委员,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1938年1月,还在南昌成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是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朱克靖。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如白丁(徐平羽)、韦布、杜宣、李增援、吴晓邦、丘东平、涂克、陈子谷,都是战地服务团的最早成员。同年7月,战地服务团随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云岭后,就组成了几个分队,先后随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渡江北上。新四军每到一地,战地服务团既是文艺宣传队,又是民运工作队,通过写标语、办墙报、教唱歌、演戏剧、展出图画、发表演讲等活动,揭露日寇暴行,传播胜利消息,动员抗日救亡,鼓舞战斗士气,成为新四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得力助手和开路先锋,直接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服务。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坚持抗日,使得一些深受国民党顽固派压制的文艺工作者和进步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冲破千难万阻投奔新四军。安徽省青年抗敌协会战地服务团200余人,在团长郭铭、副团长张望带领下,投奔到新四军江北游击支队,像陈岛、刘保罗、许晴、莫璞等知名文艺家,都是这个服务团的成员。河南省开封市的孩子剧团,沈丘县颍滨中学的前锋话剧团,项城县简易师范的海燕话剧团,均因反抗国民党当局压制而投奔新四军游击支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拂晓剧团的骨干。还有从上海、南京、重庆、武汉、长沙等地来的彭柏山、扬帆、任光、吴强、王淑明、陈辛芳等文艺工作者和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林琳、张掌珠(张茜)、王于耕等,大大充实了新四军的文艺队伍。在这个基础上,各支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战地服务团。随着华中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相继建立,地方上也成立了许多文艺团体。例如,江南先后成立了以吴宝康为团长的无锡抗日联合会战地服务团,以孟波为团长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战地服务团;豫鄂边区成立了以苏菲为社长的解放剧社,后改名为十月剧社;皖东北成立了豫皖苏边抗敌文化协会,县、区、乡、村都建立了抗战室;在皖东成立了津浦路东宣教团,天长宣教团。抗日文艺活动开始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第三阶段:从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到1943年冬。这一阶段的抗日文艺活动是围绕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伪化和反磨擦,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这个中心任务展开的。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将发展抗日文艺事业作为根据地建设主要内容之一。刘少奇先后两次主持华中局会议,讨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事业,决定办学校,培训大批文艺人才,以适应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

需要。1941年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开学,刘少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陈岛、刘保罗、莫璞、何士德、孟波分任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系和普通班主任,学员先后有千余人。淮南的苏皖边区行政学院设艺术系,后改为淮南艺术专门学校,祁式潜任校长,张泽易、孙峥、何秋征等任教,先后培训3期共600余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淮北)、第五(苏北)、第八(淮南)、第九(苏中)、第十(豫鄂边)分校和浙东鲁迅学院,都分别设有文艺班或文教系培训文艺干部。1941年4月,在刘少奇、陈毅直接指导下,苏北召开文代会,到会代表200余人,选举产生了以钱俊瑞为理事长的苏北文化协会。接着又成立了以吴天石为理事长的苏北文协苏中分会。在苏北文协推动下,还成立了以许幸之为理事长的苏北戏剧协会,以李健吾、陈辛芳为理事长的苏北诗歌协会,以莫璞、鲁莽(芦芒)为理事长的苏北木刻协会。接着,在淮南、淮北、苏南、浙东等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文化协会。在淮海抗日根据地,还成立了美术协会,原来文化上相当落后的敌后农村,文艺活动空前地繁荣起来。这一阶段的文艺活动,朝着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大众化的方向前进,在普及上做出了很大成绩。但发展不够平衡,在距日伪据点较近的边沿区和日伪经常“扫荡”、“清乡”的“拉锯区”,抗日文艺活动相对比较薄弱,著名文艺家丘东平、刘保罗、许晴、李增援等先后牺牲,文艺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第四阶段:从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环境比较稳定的淮南津浦路东搞文化实验区,到1946年秋解放战争开始。这一阶段的抗日文艺事业,主要是深入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从发展民间戏曲入手,使文艺更大众化、更普及。1944年年初,中共中央华中局在黄花岗召开文化实验区总结座谈会,交流经验。接着又召开民间艺人代表大会,会上演出滑稽戏、泗州戏、淮北高腔、花鼓、话剧、洪山戏、湖船等多种节目。为配合淮南军区在铜城检阅民兵,还组织了“百团(剧团)大会演”,大大推动了群众文艺活动的发展。与此同时,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淮海区,颁发了“文工队组织工作条例”,为专业文工队规定了任务、编制和待遇。盐阜区组织了所属9县文工团集训,在阜宁乡下演出1个多月,参加的剧团有几十个。这个时期的文艺创作十分活跃。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剧本就有三个:阿英编剧的五幕话剧《李闯王》,由新

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文工团在盐阜区演出;李一氓编剧的京剧《九宫山》,由淮海实验京剧团在淮海区演出;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编剧的五幕话剧《甲申记》,由前线话剧团在苏中演出。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南新四军北撤,淮南、淮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李一氓任主席。在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领导下,1946年3月18日至4月27日在淮阴召开华中宣教大会。这次盛会历时41天,出席代表800余人,有10多个剧团为会议演出了话剧、京剧、淮剧、秧歌剧和歌舞。淮南的农民剧作家缪文渭、淮北的大众剧团、阜宁的两个妇女秧歌队等在会上介绍了经验。这是一次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大检阅,大练兵,形成了文艺活动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苏皖边区政府北移山东,各地的文艺团体有的随军转移,有的缩编或合并,有的撤销,但大批文艺骨干,仍留在原地坚持斗争。

## 二、华中抗日文艺事业的主要成就

文学创作 诗歌,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最为繁荣的文学创作。诗歌形式比较灵活,能长能短,能高雅也能通俗,能供识字的人读,也能朗诵给不识字的人听。因此,在根据地的文学作品中,诗歌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诗歌创作还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迅速普及的墙头诗。1941年5月8日,《江淮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开展墙头诗运动,认为“是使文学深入大众的一种最好的办法”。7月19日该报又刊出《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了辛劳、林山等的墙头诗。鲁迅艺术工作团还用漫画与诗相配,发展为墙头诗画。在淮南,著名诗人蒲风也是墙头诗的热心创作者。他还将墙头诗与街头诗朗诵结合起来,使诗歌更直接地与群众见面。另一个特色,是以旧体诗词写抗日救亡的新内容。1943年创刊的《新知识》杂志,从创刊号起就有《湖海诗文选》专栏,发表湖海文艺社社员的旧体诗词<sup>[2]P561</sup>。

小说,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各种刊物和报纸的文艺副刊,经常发表小说作品。丘东平发表在《抗敌》杂志的《鏖武路上的故事》,朱微明发表在《文学者》杂志苏北版的《女犯》,钱江发表在《滨海报》的《筱忤》,石言发表在《苏中报》的《子弹》,陈允豪发表在《盐阜报》的《小鬼李新的故事》,写的都是新四军战士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无畏和成长。菡子的《纠

纷》,艾汀的《借粮》,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新生活新风貌。在小说这一样式中,短篇小说较多,中篇小说很少。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学作品要密切配合中心工作,为抗日战争服务,而战争形势变化很快,长篇小说很难适应这种需要;还因为长篇小说的创作需要较多的生活积累,需要相对安定的环境,这是战争时期难以办到的。丘东平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只写到第五章,由于他在1941年的反“扫荡”中牺牲而未能完成。被称为文学轻武器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是根据地最为常见的文学样式。这是因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为这一样式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陈毅写于1939年4月的《江南抗战之春》,是创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优秀报告文学。罗列写于1941年9月的报告文学《苦斗六年的新安旅行团》,生动地记述了新安旅行团的战斗历程。怡然写于1943年5月的报告文学《我的母亲》,感人地记述了抗日根据地生死相依的军民关系。

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很重视儿童文学的创作。新安旅行团苏北分团创办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少年儿童刊物《儿童生活》,先是油印、石印,后来发展到铅印套色,从1941年到1945年共出版了30多期。1945年9月两淮(淮阴、淮安)解放后,还出版过《华中少年》、《华中少年画报》。阿英曾因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同《儿童生活》杂志主编范政进行专题讨论,希望作者要“了解儿童与成人在身心双方面的差异性”,创作出让天真活泼的儿童们喜欢的作品,帮助他们成长。张爱萍在前线指挥战斗的间隙,定期给《儿童生活》写作长篇连载《苏维埃儿童团的故事》。1942年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作家钟望阳,创作了长篇儿童文学《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

戏剧创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活动,在整个文艺工作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军队和地方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戏剧工作,把它作为宣传抗日、激励民心、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许多戏剧人才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使戏剧活动进一步发展。新四军以及所属各支队的战地服务团都有戏剧组,开展以戏剧为主的文艺宣传活动。有的服务团、宣传队就称为剧团。1941年初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随着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戏剧活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团体,多次演出过移植的剧目,例如夏衍的《一年间》,田汉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贺敬之等的《白

毛女》，以及苏联的《前线》、《带枪的人》等。为了更好地配合中心工作，尽量做到群众喜闻乐见，他们在演出移植剧目的同时，十分重视剧本的创作。剧团编剧人员不多，所以剧本的创作几乎是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凡是能写写的人，大家都来参加创作。这些剧作者和部队一起行军，一起打仗，编写的剧本尽管艺术上粗糙一点，但无不充满了生活气息。有时战斗一结束，便很快写出剧本，立即进行排练，在祝捷会上便可演出反映这次战斗的剧目。观众看到演出，不仅为剧情所感动，也对戏剧工作者的这种战斗作风表示由衷的钦佩。王于耕、吴强、李增援编剧的《繁昌之战》，刘保罗编剧的《塔塔守备战》，张拓、黄其明编剧的《淮阴之战》，都是迅速反映战斗的多幕话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不仅创作话剧，也创作其他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较有影响的有缪文渭的歌剧《生产互助》，张拓的舞剧《雨过天晴》，黄其明的淮剧《照减不误》和《渔河边》，黄英雄的楚剧《赵连新归队》和《斩古城会》，浙东民间艺人集体创作的越剧《赤胆忠心》和《义薄云天》。根据钱瓔、小晦《华中根据地戏剧书录》一文中的不完全统计，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专业和业余剧作者先后创作的剧本共 762 个。从文中所列的作品和作者来看，收录范围未能包括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应加上浙东创作的 35 个剧目。

**音乐创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音乐创作，从一开始指导思想就很明确：用歌曲去唤起民众，扬我军威，打击敌人，歌颂胜利，教育和鼓舞广大军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团结战斗。1939年7月1日，诞生了集体作词、陈毅执笔、何士德作曲的《新四军军歌》。这首雄壮的军歌，歌颂了新四军英勇奋斗的历史，表达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决心。从此，“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歌声，响彻华中抗日根据地。类似的歌曲还有朱镜我作词的《我们是战无不胜的新四军》，赖少其作词的《渡长江》。这两首歌也是何士德作曲。1940年12月，在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北移前夕，任光创作《别了皖南》（又名《新四军东进歌》），亲自到连队教唱。这首歌是这位著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在随后发生的皖南事变中，任光英勇牺牲了。在1941年夏季的反“扫荡”战斗中，传唱着许晴作词、孟波作曲的《中华民族好儿女》，在这次大“扫荡”中，许晴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事业，为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史白作词、沈亚威作

曲的《别处哪儿有》，歌词只有六句：“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穿梭。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布朝北呀米朝南，朝北朝南只报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把解放区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高度概括地表现出来了，因而在苏中、苏北等地流传很广。由李增援作词、章枚作曲的《黄桥烧饼歌》，描写新四军在黄桥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老百姓用烧饼慰劳部队的情景，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语言朴实生动，曲调自然流畅，具有民歌风味。范政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满天星》，则是一首抒写根据地抗日小英雄的著名儿童歌曲。

这个时期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基本上都是声乐作品。其中少量是应文艺团体演出需要而创作的多声部合唱歌曲，还有一些是为话剧、歌剧所作的插曲，绝大部分是便于战士和人民群众演唱的短小精美的歌曲。这是因为，在战斗十分频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创作大型音乐作品的困难较多，也不便于普及。特别是器乐作品的创作，困难就更多。在敌后的农村，连二胡、笛子这类的乐器都很难找到，就更谈不上大型乐器和西洋乐器了。即使能创作出大型器乐作品，也没有乐器演奏。因此，既便于创作，又能紧密配合中心任务的短小歌曲，便成了根据地音乐创作的主要成果。在整个抗日战争年代，华中抗日根据地一共创作了多少音乐作品，如今已难以计数。1999年9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歌曲》一书，就收集了496首。

**美术创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美术活动十分活跃。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美术工作者克服困难，举办美术展览，设置街头画栏，出版美术刊物，创办美术工厂，充分发挥了美术作品为抗日战争服务，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美术系在盐城举办的美术展览，展出的作品多达300余幅。淮南艺术专门学校师生到集市上举办巡回美术展览，足迹遍及淮南津浦路东地区的8个县。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创办的《抗敌画报》，是最早出版的美术刊物。此后，还出版了《皖中画报》，苏北的《先锋画报》、《苏北画报》、《盐阜画报》、《淮海画报》、《叶挺画报》，淮北的《拂晓画报》、《人民画报》，鄂豫边区的《七七画报》，苏南的《前哨画报》，皖江的《大众画报》、《武装画报》、《大江木刻》，浙东的《战斗画报》。报纸杂志也经常刊登美术作品。《江淮日报》常有鲁莽（芦芒）等配合新闻报道的木刻、速写。由

于战争环境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美术用品十分匮乏,印刷设备极其简陋,美术工作者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困难,创造了墙画、布画、画传单、油印画等多种绘画形式。

### 三、华中抗日文艺的主要特点

从抗战爆发、新四军挺进华中到抗战胜利、新四军番号撤销这 10 年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活动,是在中共华中局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推动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抗日军民的努力,因地制宜地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以下特点:

#### (一) 紧密贴近抗日的时代脉搏

新四军挺进华中,是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开辟和建设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生产建设。广大文艺工作者就紧紧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新四军挺进到哪里,抗日文艺宣传就开展到哪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抗日文艺以提高根据地军民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为目标,揭露日伪的罪恶,表彰抗日英雄和先烈,鼓舞抗日军民士气,保卫、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事业中,留下了文艺工作者奋斗的足迹。

#### (二) 坚持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实践

在新四军组建初期,陈毅、袁国平等领导人就提出了文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强调文艺要为抗日斗争服务,必须从抗日军民的接受能力出发;只有深入下去,了解和熟悉抗日军民,才能更好地用文艺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内容上就地取材,写根据地的真人实事,群众熟悉;形式上大量吸收民歌民谣和民间戏曲,群众喜闻乐见。还通过教唱抗日歌曲,组织自编自演,开展墙头诗画活动,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样做,一方面,文艺工作者在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事业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人民大众也走进了艺术殿堂。这是革命文艺和千百万群众革命实践的结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创新

抗日文艺要能发展,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创新,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学艺术,改革不适合新时代的那部分内容和形式。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虚心向民间艺人学习,把民间流传的花鼓、莲湘、湖船、小放牛、大补缸、扬州小开口等艺术形式和民歌民谣挖掘

出来,经过加工,换上抗日内容,到群众中教唱,“旧瓶装新酒”,收到很好的效果。同时,还注意研究改革地方剧种。阿英在盐阜区研究改革淮剧,指导编演《照减不误》、《渔河边》等现代戏。李一氓在淮海区建立实验京剧团,把《缶鼓骂曹》改为《缶鼓骂汪》,编演了京剧《仇宫山》。黄源在浙东改革越剧,编演抗日节目,提倡男女同台。新四军第五师的楚剧队,编演了许多新剧目,甚至以楚剧来反映新四军的战斗生活。淮南、淮北等地还把旧艺人组织起来,成立“艺人救国会”,举办抗日艺人培训班等,帮助他们编演抗日新节目。适应农民过春节要贴“牛印”的风俗习惯,美术工作者绘制的《抗战八仙》新“牛印”,在苏北、苏中风行一时。这些都说明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创新是大有可为的。

#### (四) 尊重、关怀、引导、支持文艺人才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有一支来自沦陷区、大后方和东南亚归国华侨的文艺队伍。对于这批文艺工作者,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和民主政府很是尊重他们。他们初来乍到时,一时难以适应革命文艺的写作,就通过组织学习、开作品讨论会、个别交谈等多种形式给以引导,并尽一切可能为他们提供写作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在反“扫荡”、反“清乡”最艰苦、最危险的日子里,为保证安全,一批知名文艺家被护送到后方和延安。他们从亲身经历中感受到抗日根据地内,尽管战事频繁,环境紧张,生活艰苦,但创作受到充分尊重,人身很自由,心情很舒畅,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处境不可同日而语。邹韬奋带病来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阿英率全家投奔苏北新四军,都表明他们的向往。同时,在严峻的革命实践中,培养了一批乡土气息浓厚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创作,为丰富多彩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事业增添了光辉,后来又成了新中国文艺运动的新生力量。

### 四、华中抗日文艺的影响

华中根据地的抗日文艺事业,坚持了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而成为整个抗日战争的一条重要的战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方面,发挥了号角、战鼓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揭露敌人、打击敌人方面,发挥了投枪、匕首的战斗作用。新四军走到哪里,根据地建立到哪里,哪里就有抗日文艺活动。文艺工作者们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戏剧、音乐、墙头诗、墙头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斗争的形势,引导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参军支前、拥军优属、大生产等各项工作中,都有文艺作品配合宣传,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红鼻子参军》、《送郎上前线》等小戏剧每次演出后,都有一批年轻人要求参军。此外,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种样式中,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作品都占有很大比重。这类作品的战斗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揭露敌人的凶狠残暴,激起广大军民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例如有的群众在看戏时,竟要去打演反角的演员,经过解释才从戏剧氛围中清醒过来。二是揭露日寇的残暴,树立起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心。每次部队打了胜仗,几乎都要产生一批这类主题的作品,对鼓舞军民的胜利信心起了很大作用。三是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士气。苏中三分区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种叫“通行证”的画传单,宣传我军优待日伪军弃暗投明的政策。日伪军弃暗投明时,凭此“通行证”可在根据地通行。画传单发到日伪据点后,常有日伪军带着此“通行证”前来投诚。

第二,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发挥了与各界人士沟通、团结的作用。在同赞成

抗日的上层人士交往中,根据地的领导人常常采用诗词唱和、以文会友的方式,先从沟通感情开始,再进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工作。陈毅在苏北创作的诗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同抗日民主人士的唱和之作。通过这些作品,不仅同各界人士沟通了感情,向他们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而且改变了有些人认为新四军是大老粗军队、干部是草莽英雄的错误看法,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威望。

第三,在推动根据地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促进、激励的作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反映根据地建设的文艺作品,又反过来推动着根据地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仅就音乐作品而言,题材范围几乎覆盖了根据地的所有方面,其宣传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如《送才郎》、《甯桥烧饼歌》、《到处哪儿有》、《刘桂英是朵大红花》等歌曲,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这类作品,唱出了根据地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对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的拥护,表达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巨大的精神力量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 [参 考 文 献]

[1]上海市和江苏、安徽、浙江省文化厅(局)史志办.华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工作大事记[Z].1996年12月.

[2]马洪武.华中抗日根据地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Central China

CAO Jir-jie

(Yancheng Political consultation, Yan chen 224000 China)

**Key Words** New Fourth Army central China area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bstract** 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Central China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1. from the Lugouqiao Incident to April 1938; 2. from May 1938 to the Wannan Incident; 3.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Fourth Army's Headquarters; 4. from Nov. 1943 to the Liberation War in 1946.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re: 1. close to the pulse of the time; 2. persisting in the practice for the people; 3.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 4. respecting and concerning the talented persons. The influences of 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are: 1. organizing the people to join the anti-Japanese war; 2. buil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3.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base area. The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Central China plays an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obilizing the masses to join the anti-Japanese war, exposing and beating the enemy, buil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and promoting the various affair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责任编辑:周 棉]